

江永《近思录集注》版本源流考

程水龙

《近思录》是南宋时期朱熹、吕祖谦类编周敦颐、程颢、程颐、张载四子语录而成。作为理学入门基础读物的《近思录》，它在理学思想传播和朱子学研究中具有相当重要的经典地位。对其注解者宋元明清各朝皆有，注家甚多，形式多样，是儒道经典之外的其他著述难以媲美的。自南宋至清乾隆时期，在《近思录》众多注本中，当推叶采《近思录集解》最佳。然而当乾隆年间江永《近思录集注》（以下简称《集注》）问世后，叶采《集解》在注本中的主导地位便让位于它。此后的一百六十馀年中，江永《集注》的覆刻本、重刻本、校勘本交错出现，现存抄本、刻本、石印本共计不少于27种。江永《近思录集注》版本的多样性是除叶采《集解》外的《近思录》注释本所绝无仅有的，故有必要考证之。今对《集注》各时期的版本逐一梳理，注其存佚，考其源流。

一、江永《近思录集注》原刻本及其重刻本

江永（1681-1762），字慎修，号慎斋，安徽婺源人。曾著有阐述宋五子的著述数十卷。作为乾隆时期大儒，他熟读经典，对经学研究精深，尤擅长声律考据，著述甚多。他集注《近思录》，引据详洽，绝非那些空谈尊朱者可比。

据江永《近思录集注序》，他认为：《近思录》“直亚于《论》、《孟》、《学》、《庸》，岂寻常之编录哉！其间义旨渊微，非注不显。考朱子朝夕与门人讲论，多及此书，或解析文义，或阐发奥理，或辨别同异，或指摘瑕疵，又或因他事及之，与此相发，散见《文集》、《或问》、《语类》诸书，前人未为之荟萃者。”^①从此语窥其集注之动机，就是要做前人未做的荟萃朱子之语，来发明《近思录》奥义之事。《四库全书总目·近思录集注》“提要”则说“淳祐间，叶采纂为《集解》，表进于朝，虽阐发不免少略，尚无所窜乱于其间。明代有周公恕者，始妄加分析，各立细目，移置篇章，或漏落正文，或淆混注语，谬误几不可

^①见（清）江永《近思录集注》，清乾隆七年（1742）刻本。

读。永以其贻误后学，因仍原本次第为之集注。”^①事实上，江永差不多一生心系《集注》，用功尤深、持久，其自序云：“永自早岁，先人授以《朱子遗书》原本，沈潜反复有年。今已垂暮，所学无成，日置是书案头，默自省察，以当严师。窃病近本既行，原书破碎，朱子精言，复多刊落。因仍原本次第，哀辑朱子之言有关此《录》者，悉采入注。朱子说未备，乃采平岩及他氏说补之，间亦窃附鄙说，尽其馀蕴。盖欲昭晰，不厌详备。由是寻绎本文，弥觉义旨深远，研之愈出，味之无穷。窃谓此《录》既为四子之阶梯，则此注又当为此《录》之牡钥，开扃发镞，祛疑释蔽，于读者不无小补。”江永《集注》一经面世，很快受到世人青睐，得到学术界推崇，成为其后《近思录》注解本的代表，在清代后期非常通行。四库馆臣评价道：“凡朱子《文集》、《或问》、《语类》中其言有相发明者，悉行采入分注，或朱子说有未备，始取叶采及他家之说以补之，间亦附以己意，引据颇为详洽。盖永邃于经学，究心古义，穿穴于典籍者深。虽以余力为此书，亦具有体例，与空谈尊朱者异也。”^②

现存最早的江永集注，是乾隆七年（1742）刻本，十四卷，卷端题“婺源后学江永集注”。半页九行二十字，注文小字双行二十字，四周双边，白口，单鱼尾；框高19.3厘米，宽14.5厘米。版心刻书名“近思录”、卷次、页码。卷首依次为乾隆壬戌年（1742）九月江永《近思录集注序》（下文简称“江永序”），《近思录书目原序》，《近思录集注审定及校勘姓氏》（下文简称《校勘姓氏》），《近思录集注凡例》（下文简称《凡例》）。卷十四末衬页刻撰者、卷名：“江慎修先生手定/考订朱子世家”，接之为江永《考订朱子世家引言》（下文简称《引言》），《考订朱子世家》一卷（下文简称《考订》）^③。文中有17处“弘”字缺末笔，避乾隆讳。《引言》中“圣”提行，凸出原版框一个字格刻印。因此，从江永作序时间、卷端题识、避讳推断，该本极有可能是江永《近思录集注》的原刻本。篇名采用《朱子语类》中朱子所言的“纲目”^④，如卷一“朱子曰此卷道体”。南京图书馆藏本，四册。有的卷页破损或被虫蛀蚀，佚名朱笔句读。钤有朱文印：“东亚同文书院大学图书馆印”。

乾嘉时期，江永《集注》的覆刻、重刻本今存世的已不多。乾隆后期或许有《集注》刻本或抄本，据王鼎《朱子原订近思录序》：“余奉命视学江右。……忆

①《四库全书》，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本，第699-357页。

②《四库全书总目》，中华书局，1965年版，第781页。

③江永《集注》为何附录《考订》一卷。据《引言》知，江永意在于订正《婺源志》的疏失，考朱、陆异同之说，洵有正本清源之功，也流露出他对朱子的尊崇。

④（宋）黎靖德编，王星贤点校《朱子语类》卷一〇五，云：“《近思录》逐篇纲目：一道体，二为学大要，三格物穷理，四存养，五改过迁善、克己复礼，六齐家之道，七出处进退辞受之义，八治国平天下之道，九制度，十君子处事之方，十一教学之道，十二改过及人心疵病，十三异端之学，十四圣贤气象。”中华书局，1994年版，第2629页。

予廿年前得婺源江氏慎修《集注》，极为完善。”^①王鼎此序作于嘉庆十九年，上推二十年，即乾隆五十九年（1794）前他得到江永《集注》。然而，这个“江慎修《集注》”是谁抄或刻，何时成型，因缺乏文献佐证，只能存疑、待考。

现存江永《集注》的最早重刻本，是嘉庆十二年（1807）李承端校订覆刻本，并附《考订》一卷。《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》（下文简称《标注》）著录为“嘉庆丁卯京师刊本”，《书目答问补正》著录“嘉庆间有京师”刻本，时间地点上都与李承端刻本吻合。据李承端跋文，嘉庆十年他在京城从朱文正公^②处得到《集注》抄本，“端受书退，因与锐斋汪君互相校讎，订其讹舛，请正于师，醵资授梓”^③。李承端与汪德钺校讎订讹的底本应是朱珪交与的《集注》本，嘉庆十二年刻成时李氏作跋记之。卷首牌记为“婺源江慎修先生手辑近思录集注/嘉庆丁卯镌；版存琉璃厂东门桶子口同龙文斋甘姓”。该本的版式、卷端题识、内容与江永原刻本相同。卷首有江永序、《书目原序》、《凡例》、《校勘姓氏》；卷十四末的衬页、《考订》内容与乾隆七年刻本同，末刻李承端跋。《引言》中“圣”亦提行，凸出原版框一个字格刻印。上海图书馆藏本，二册，钤“莫绳孙”、“莫祥印”、“莫棠之章”、“独山莫祥芝图书记”等印章。

江永《集注》面世之后，后世不断有人传抄刊刻，公私书目著录时，对与著录者时代接近的某些刻本、抄本注记比较简略，其中有的版本今天已难见到，这便使得我们难以清晰知晓某些版本信息。如《标注》、《藏园订补邵亭知见传本书目》著录有“婺源刊本”，那么婺源刊本刻于何时呢？两书目都将其排列在“嘉庆壬申江西督学王鼎刊本”后。而邵懿辰、莫友芝二人主要生活在清道光年间，均为藏书名家，不可能随意编次书目内容，所见“婺源刊本”在当时应该存世。那么，又是何人刊刻呢？据同治八年应宝时跋文说：“予权篆苏藩，值书局开雕书籍，爰出旧藏婺源洪氏刻本，暨吴刻本，属元和王孝廉炳校刊之。”^④应宝时曾藏有“婺源洪氏刻本”，此洪氏刻本刻于何时，应氏未言。但我们可以从清同治八年江苏书局刻本附录的王炳《校勘记》中找到一点线索，当时王氏用的参校本之一就有“洪本”；并且，应宝时自己在比较一些版本时，还说自己所见到的“王、洪诸本均无”《考订》，这便说明同治八年时，婺源洪本还存世。然而，今存江永《集注》本中却不见，所以“婺源刊本”与“洪本”的关系只有待考了。

李承端之后接之刊刻《集注》者，目前能见到的是道光甲辰（1844）大梁书

①见江永集注《朱子原订近思录》，清嘉庆十九年（1814）王鼎校次本。

②朱文正公，即朱珪（1731—1806），字石君，直隶大兴（今属北京）人。与兄竹君朱筠齐名。乾隆戊辰（1748）科进士，历任很多要职，官至体仁阁大学士，是乾嘉间的名臣，清高不俗，清明廉洁。卒谥文正。

③见（清）江永《近思录集注》，清嘉庆十二年（1807）李承端校订本。

④见（清）江永《近思录》，清同治八年（1869）江苏书局刻本。

院刻本,也称张日晟^①刻本,《近思录》十四卷,并附《考订》一卷。由于江永集注以朱注朱,考据精切,后世褒扬尤多,张日晟《重刊近思录集注序》云:“自叶仲圭《集解》以下,注释者数家,为此最为善本。道光壬寅,日晟承乏大梁,给谏星湖前辈方主讲于斯,每进诸生课以前贤语录文字,士多砥行自爱者。一日携此本示余,大兴朱文正公所刻也。余受而读之,豁然如昧之得明,奋然如蹶之思起。因知原刊板已散失,传本久稀,爰为重校付梓,以授院生,使人各一编,诵习探玩,身体力行,其于学术人心必有兴起者矣。刊既成,谨识岁月缘起于首简。《朱子世家》一篇,《婺源志》旧文而江先生订定者,原本附刻于后,今亦仍其旧云。道光甲辰春三月,贵筑张日晟序。”由此可知他是据道光壬寅(1842)见到的大兴朱珪刊本重刻。张日晟重刊本的版式与江永原刻本很相近、内容相同。扉页牌记为“江慎修先生手辑近思录集注道光甲辰重镌 板存大梁书院”。卷首有张日晟重刊序文,江永序,《凡例》,《书目原序》;卷十四末后的衬页、《考订》内容以及跋文,与嘉庆年间李承端校刊本相同。南京图书馆藏本,四册,少数卷页佚名朱笔点句读,李承端跋缺半页。

清咸丰三年(1853)刻本《近思录》,并附《考订》一卷。该本卷端题识、版式、内容与道光大梁书院本相同,卷首刻江永序,《近思录书目原序》,江永《凡例》、《考订》一卷。扉页上端刻“咸丰癸丑重镌”,下方自左至右刻“江慎修先生原辑/五子近思录集注”。上海图书馆藏本六册,仅缺《引言》,疑为装订脱漏。钤印“愚斋图书馆藏”。

光绪十五年(1889)金陵书局(又名江南官书局)刻本《近思录》,并附《考订》一卷。卷首有江永序,《近思录书目原序》,江永《凡例》、《考订》一卷。卷端题识、版式、内容与张日晟重刻本一样。扉页牌记为“光绪己丑年于金陵书局重刊”。安徽省图书馆、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有藏。

光绪年间另有两种“婺源后学江永集注”《近思录》刻本。笔者目验后,发现两种刻本的扉页、序跋、题识、版式、内容均与大梁书院刻本相同。它们应当是据大梁书院本重刻。其中一种牌记为“光绪壬申岁维新局校刊”,华东师大图书馆藏本,四册;另一种牌记为“光绪壬申岁裕德局校刊”,安徽省图书馆藏本,四册。但是,由于两刻本的牌记均刻有“光绪壬申岁”,光绪朝却无“壬申”年,笔者以为二牌记有误,又不知刻梓者为何如此,故尚不能知道两种刻本确切的刻印时间。维新局刻本版片模糊,字迹漫漶;安徽图书馆藏裕德局校刊本的少数书页有佚名朱笔圈点。

此外,还有一种刻本《近思录》十四卷,“婺源后学江永集注”,并附《考订》一卷。其卷首序文以及版式、内容,均与大梁书院刻本很相近。其扉页上端刻“钦定”,下方刻“朱子近思录”。因其印刷字迹较模糊,疑为后印本,刻印时

^①张日晟,原名日暄,字东昇,号晓瞻,贵州清镇人。嘉庆二十二年进士,改庶吉士,授编修。典湖南、浙江乡试,出为叙州知府,调任成都知府,迁浙江盐运使,官至云南巡抚。

间可能在光绪年间。华东师大图书馆藏有此本,二册。

二、王鼎校次本《朱子原订近思录集注》的传刻

江永《集注》面世以后,除不断有人覆刻重刻外,后世也有对当时的《集注》传本进行校勘重刻的,王鼎校次本为其中代表。王鼎(1768-1842),字定九,号省崖,陕西蒲城人。嘉庆元年进士,选庶吉士,授编修,官至户部尚书,授东阁大学士,卒谥文恪。

嘉庆时期的理学名臣王鼎为何要校刊江永《集注》呢?从王鼎序文可知,他很重视《近思录》在教育上的基础作用,认为学之可持己、戒浮薄、致力道德、醇风俗、育真才、立己立人、达己达人,所以他把刊刻江永《集注》也作为自己的为官职责。嘉庆十七年奉命视学江右时,王鼎便把《近思录》作为教育学子入德的门户,“顾其所读本,率皆近世汪氏、施氏之编,且坊刻歧误甚多,非复朱子之旧矣。忆予廿年前,得婺源江氏慎修《集注》,极为完善,十年前又得大兴朱文正公与徽人之宦京师者新刻江氏本,合而校之,藏诸篋中。因出以商诸中丞芝圃先公,重为刊刻,遍示学宫弟子,公曰善。……兹刻江氏《集注》,标名曰《朱子原订近思录》,从其朔也。”并叮嘱读此书者“若夫拘守是书而不复旁通,徒事口耳而不求心得,甚或摭拾腐说,支离傅会,而一毫无裨于实用,反使记诵之学嗤其陋,词章之学哂其拙,此则蹈嘉定以来末学谈理之流弊,非今日刊刻之意矣。读者幸鉴余之苦心也夫。”^①另据嘉庆十九年先福《重刻近思录序》说,王鼎“因属刊《近思录》,遍布学宫,俾知证羈。爰与方伯、廉使、观察诸公,共商剞劂。梓成,因弁简端,并敬告以勸多士。”由此可以肯定王鼎将不同版本的《集注》传本合校刊刻,旨在用于教化民众,以此作为学宫的阅读书籍。其校刊本用“朱子原订”字样标书名,意在力图恢复朱子《近思录》的原貌,既与当时见到的新安朱氏本、汪佑本、施璜本等区别开来,也与江永集注时要还《近思录》旧貌的想法一致。由于王鼎等人的校刊之功,其刊本在嘉庆年间影响较大,重刻本颇多,在清朝中后期朱子学思想的传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
王鼎校次本江永《近思录集注》清嘉庆十九年(1814)刻于江西,半页九行二十字,注文小字双行二十字,四周双边,白口,单鱼尾。框高18.7厘米,宽14.3厘米。卷首依次有嘉庆十九年先福序,嘉庆十九年王鼎序,江永序,《凡例》,《朱子原订近思录书目原序》;卷十四末有李承端跋。扉页牌记为“嘉庆甲戌重镌朱子原订近思录集注/板藏江西藩署册库”。此本未收江永《考订》一卷。王鼎序文中凡“国”、“朝”、“功令”、“文教”、“命视”、“皇上”、“圣天”均提行凸出原框字格刻印。李承端跋为补刻合订。《标注》著录的“嘉庆甲戌江西刊本”,《书目答问补正》著录的“嘉庆间有”“江西”刻本,从刊刻时间、地点看,或许就是该刻本。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本,四册,钤有“仲枯手校”、“独山

^①见(清)江永集注《朱子原订近思录》,清嘉庆十九年王鼎校次本。

莫祥芝图书记”、“莫祥印”、“莫棠之章”、“丁福保鉴藏经籍图书”等印章。

值得注意的是,《标注》、《邵亭知见传本书目》著录有“嘉庆壬申年江西督学王鼎刊本”^①。但是笔者对“嘉庆壬申年”(十七年)刻本是否存在,心存疑惑。因为《标注》著录的两种江西刻本,一种直言“壬申年”“王鼎刊本”,一种言“嘉庆甲戌江西刊本”,即嘉庆十九年王鼎刻本;而《邵亭知见传本书目》著录的与其中一种一样,即“嘉庆壬申年江西督学王鼎刊本”。那么,王鼎在嘉庆十七年、十九年会连续刊刻《集注》吗?这样仅相隔两年刻印同一本书,似乎不太符合事理。再读王鼎序文,他取家藏《集注》“商诸中丞芝圃先公,重为刊刻……公曰善。遂与方伯柏田袁公、廉访孟岩盛公,暨僚属等,输貲发刊,起癸酉冬十一月,越次年夏五月告成,按学分大小而周布之,盖人人得善本焉。”可知王鼎刊本于嘉庆癸酉(十八年)冬开雕,次年(十九年)夏刻成,历时六个来月,并有序文落款时间“嘉庆十有九年岁次甲戌夏五月关中王鼎序并书”可为证。又据参与刊刻者先福在梓成时的作序时间“嘉庆十九年岁在甲戌春二月”,可以推知邵懿辰、莫友芝著录的刊刻时间似乎存在问题,也许无“壬申年”刻本,而只有“甲戌”年王鼎结合所得“婺源江慎修《集注》”和朱珪本,刻成的《朱子原订近思录》十四卷。嘉庆之后,王鼎校次本的众多重刻本都是以此江西藩署刻本为底本。现存重刻本《朱子原订近思录》不少于8种,卷端均题“婺源江永集注,关中王鼎校次”。笔者一一目验如下:

清同治年间,江永《集注》原刻本已稀,吴棠^②重刻之,意在广泛传播《集注》,他说:“《近思录》通行淳祐间叶采《集解》本。江氏《集注》成于乾隆七年,刊本辄未易得。山阳丁俭卿晏好蓄书,而所有亦仅《集解》。往岁秋,俭卿长子寿昌出守严州,篋中携有王文恪公刻本,出以见示,读之恍接寒泉纂论馨欬,怡然涣然,命工重刻,延秀水高伯平均儒校订,凡七月而毕。溯注成之始,今已一百二十四年。……可见是书刻本无多得,故不易而寻绎。”^③现存吴棠刻本,有清同治三年至四年(1864-1865)望三益斋刻本《朱子原订近思录》。半页七行十八字,注文小字双行十八字。版心刻“望三益斋”。卷首、卷末的序跋除多出《四库全书总目·近思录集注》“提要”、同治四年盱眙吴棠《跋》外,均与王鼎刊本同。扉页牌记为“同治三年十月启工,四年四月刊成”。卷端所题书名、注校者亦与王鼎刊本同。据吴氏跋文,同治三年丁俭卿长子丁寿昌^④出守严州时,

①(清)邵懿辰:《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59年版,第391页。(清)

莫友芝、(民国)傅增湘:《藏园订补邵亭知见传本书目》,中华书局,1993年版,第44页。

②吴棠(1813-1876),字仲宜,一作仲仙,号棣华,江苏盱眙人。道光十五年举人,授江苏清河知县,以治淮起家。同治二年擢漕运总督,调江苏巡抚。同治四年官两广总督,六年任四川总督。谥勤惠。撰有《望三益斋存稿》。

③(清)吴棠《跋》,见江永集注《朱子原订近思录》,清同治三年至四年望三益斋刻本。

携有王鼎刻本,吴棠读后重刻。此刻本存世多部,上海图书馆、复旦大学图书馆、南京图书馆等有藏。

同治七年(1868)楚北崇文书局^②重刻望三益斋本《朱子原订近思录》十四卷。即应宝时跋文所云:“往年盱眙吴公得王文恪公江右雕本重刻于袁浦,楚北崇文书局踵而刻之”。其序跋、内容、卷端题识、版式、框栏高宽、字体与吴氏望三益斋刻本相同,牌记为“同治七年楚北崇文书局开雕”。《书目答问》著录的“武昌局本”,从刻书地看,可能即此本。笔者见到的华东师大图书馆、上海图书馆、南京图书馆藏本,目录、内容、版式、字体相同,应同出一版。

光绪元年(1875)香山何璟重刻本《近思录》。何璟(1816—1888),字伯玉,号小宋,清香山(今广东中山)人。道光二十七年进士,曾任许多要职,晚年主讲粤地的应元书院。曾刊刻江永集注《近思录》。笔者无缘睹此荆,据《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中国古籍目录》著录,其卷端题:“婺源江永集注,关中王鼎校本,香山何璟重刊。”卷末光绪元年何璟跋曰:“《近思录》十四卷,江注尤重于时。嘉庆间朱文正公始刊江注于京邸;及王文恪公任督学,又刊于江西;同治初吴仲宣漕帅又刊于清江;近又刊于鄂省书局。惟粤省中流传未广,余因检家藏王本重梓之,凡五刻矣。”^③因而,可知何璟为在粤推广江永《集注》,据家藏王鼎校刊本重梓。《书目答问补正》著录的“广州”局重刻本,或许与此有关。

光绪十一年(1885)江西书局刻本《朱子原订近思录》。卷首依次为《四库全书总目·近思录集注》“提要”、张日晟序、江永序、《近思录书目原序》、《凡例》。卷十四末刻王炳《校勘记》一卷,江永《引言》、《考订》一卷,应宝时跋。牌记为“光绪乙酉孟春江西书局开雕”。该本版式、框栏高宽、卷端所题书名、注校者、内容与王鼎刊本相同,而且还可能受到当时流传的江苏书局刊本影响,增入了王炳《校勘记》一卷、江永《考订朱子世家》一卷,以及应宝时跋文。华东师大图书馆、南京图书馆等有藏。

与江西书局刊本类似的,还有光绪十八年(1892)江西两仪堂刊本《朱子原订近思录》。其版式、框栏高宽、卷端题识、序跋、内容均与光绪十一年江西书局刻本同,并增入了《考订》一卷、《校勘记》一卷。扉页牌记为“光绪壬辰年江西两仪堂钲板”,版心刻“两仪堂”。安徽省图书馆藏本,四册,装订有误,将《近思录书目原序》后三页装订在《引言》后,《引言》的最后一页装订在卷末

①丁寿昌(1818—1865),字颐伯,好菊泉,江苏山阴人。丁晏(1794—1875)长子。道光二十七年进士,改庶吉士,官户部主事,升山西司员外郎。咸丰九年任顺天乡试同考官,擢四川司郎中。同治三年任福建道监察御史,三年授浙江严州府知府。有《睦州存稿》八卷。

②湖北书局,同治六年湖广总督兼湖北巡抚李瀚章创立于武昌,后又合并崇文书局,故又称湖北崇文书局。

③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系统编:《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中国古籍目录》,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,2004年,第232页。

的《校勘记》后。

光绪十四年(1888)广雅书局刻本《朱子原订近思录》。版心刻“广雅书局重刊”;牌记为“光绪十四年仲秋广雅书局刻”。此本卷首尾载录的序跋与吴棠刻本同,卷端所题书名、注校者名与王鼎刊本同。因而,它既有可能依王鼎校次本为底本,又参照了同治年间的吴氏刻本,且增入了《考订》一卷。《标注》、《八千卷楼书目》著录的“广雅局本”,即此本。上海图书馆、南京图书馆、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等有藏。

光绪十五年(1889)长安少墟书院刻本《朱子原订近思录》。半页九行十七字,注文小字双行十七字。版式与王鼎校刊本相近,卷端所题书名、注校者名,以及体例、内容与王鼎刻本同。卷首有江永序,《凡例》,《朱子原订近思录书目》。扉页题书名“朱子原订近思录集注”,牌记为“光绪屠维赤奋若阳月刊板藏长安少墟书院 愿刷印者不取版资”,光绪“屠维赤奋若”,即光绪己丑年(十五年)。安徽省图书馆藏本,四册。《安徽文献书目》著录^①。

光绪二十五年(1899)浙江官书局^②刻本《朱子原订近思录》。其版式、卷端所题书名、注校者名,以及内容、体例均与望三益斋刻本相同,框高、宽相近。此刻本卷首依次为《四库全书总目》“提要”、王鼎序、江永序、《凡例》、《近思录书目》。牌记为“光绪己亥余月重镌于浙江官书局”。上海图书馆、南京图书馆、黑龙江省图书馆等有藏。

三、江苏书局刊本江永《集注》的传刻系统

在江永《集注》的传刻过程中,清同治八年(1869)出现了一种新的整理形式刻本,即应宝时结合婺源洪氏本、吴棠望三益斋刻本校刊的《集注》,它是江永《集注》传本在后期的主要代表之一。应宝时(1821-1890),字敏斋,永康人。清道光二十四年举人。同治四年任苏松太道。曾创建龙门书院,开办普育善堂。同治九年任江苏按察使,兼署布政使。

从应宝时跋文可知,在他眼里江氏《集注》是《近思录》叶采集解之后最好的注解。他说:“朱文正公称其‘至为精切,裨益于世道人心不浅’,非虚言也。……予权篆苏藩,值书局开雕书籍,爰出旧藏婺源洪氏刻本,暨吴刻本,属元和王孝廉炳校刊之。孝廉以各本互有异同,复取《语类》、《或问》诸书详加雠校,订正舛讹,然后付诸剞劂。……江氏复有《考订朱子世家》一篇,正邑志之疏失,于朱、陆异同之说,考之尤详,末附《天宁寺会讲辩》,辟谬订讹,皆读朱子书者所不可不知也。贵筑张君序称原本附刻《集注》之后,今王、洪诸本均

^①安徽省图书馆编《安徽文献书目》云“《近思录集注》一四卷,清光绪长安少墟书院刊本,四册。”安徽人民出版社,1961年版,第112页。

^②浙江官书局创始于同治六年,一作四年。张秀民《中国印刷史》说:“各局刻书多而最精者,首推浙江官书局。”上海人民出版社,1989年版,第561页。

无之。今据吴氏所刻补刊附后,俾还江氏之旧云。同治己巳夏五月永康后学应宝时谨识。”同治年间,应宝时在刊刻《集注》时,据吴棠刻本补刊了王鼎和洪氏刊本均无的《考订》;同时,请王炳以洪本、吴本为底本,参校王鼎刊本,结合《语类》、《或问》等进行校刊,撰《近思录集注校勘记》一卷并附卷末。

同治八年江苏书局(又名苏州书局)刻本《近思录》,附《考订》一卷,王炳录《校勘记》一卷。半页九行十九字,注文小字双行十九字;左右双边,白口,单鱼尾;框高18.9厘米,宽13.1厘米。卷端题“婺源后学江永集注”。扉页牌记为“同治八年夏江苏书局刊”。卷首依次为《四库全书总目·近思录集注》“提要”、王鼎序、江永序、《近思录书目原序》、《凡例》。卷十四末有应宝时跋,又一册首页刻卷名“考定朱子世家”,牌记为“同治八年五月合刊”,接之刻张日畧序,江永《引言》、《考订》一卷,王炳《校勘记》一卷。从刻本的牌记、正文内容、体例,以及应氏跋文看,江苏书局刊本就是应宝时在洪氏刻本、吴棠刻本基础上重刻江永《集注》。《书目答问补正》著录的“苏州”重刻本,可能是江苏书局刊本。国内多家图书馆有藏。

对于应宝时此刊本,某些书目著录有别,如《藏园订补邵亭知见传本书目》著录为“清光绪八年应宝时特刊本”^①,而《贩书偶记续编》著录为“同治八年永康应宝时刊”^②。刊本的时间谁是谁非呢?而现存江苏书局刊本,刻有“同治己巳夏五月永康后学应宝时谨识”的跋文,且王炳的《校勘记》也于同治八年第一次刻成面世,因此《藏园订补》所言“光绪八年”疑为“同治八年”之误。

后世江苏书局刊本《集注》的重刻本及其石印本颇流行。如:

光绪十五年(1889)扫叶山房刊本《近思录》,并附《考订》一卷、《校勘记》一卷。版式行款、书名、题识、卷首所刻序文以及卷十四末所刻内容,与江苏书局刊本同,牌记为“光绪十五年扫叶山房刊”。华东师大图书馆藏本,二册。

光绪三十年(1904)蜀东善成堂刻本《近思录》,并附《考订》一卷、《校勘记》一卷。其所刻序跋、版式、卷端题识、内容与江苏书局刻本相同,扉页牌记为“光绪甲辰仲春月蜀东善成堂重镌”。南京图书馆藏本,一函六册,装订有误,把王炳《校勘记》的第27页错装在卷首序文中。

清末,坊间纷纷以石印取代雕版。作为清晚期《近思录》注本的主流者,江永《集注》的石印本也应时而生。例如,清道光二十四年(1844)上海鸿章书局石印本,藏沈阳市图书馆;清同治八年(1869)上海文瑞楼石印本,藏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^③。

光绪二十七年(1901)文瑞楼石印本《近思录》,并附《考订》一卷、《校勘

①《藏园订补邵亭知见传本书目》,第45页。

②(清)孙殿起:《贩书偶记续编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0年版,第103页。

③《东北地区古籍线装书联合目录》,辽海出版社,2003年版,第1567页。

记》一卷。该本半页十四行二十九字,注文小字双行二十九字;四周单边,白口,单鱼尾。框高15.8厘米,宽11.2厘米。其序跋、卷端题识、正文内容、体例均与江苏书局本相同,扉页牌记为“光绪辛丑夏上海文瑞楼石印”。华东师大图书馆藏本有佚名朱笔圈点句读。

民国年间扫叶山房石印本《近思录》,并附《考订》一卷、《校勘记》一卷。卷端题识、序跋、正文内容、体例均与江苏书局刊本相同。上海图书馆藏本中,一种石印本(线634202-05)扉页印“民国十五年孟夏重校/近思录集注/上海扫叶山房发行”,牌记为“民国十五年石印,扫叶山房”;另一种石印本(线普635117)扉页印“民国十一年孟夏重校/近思录集注/上海扫叶山房发行”,牌记为“民国廿一年石印,扫叶山房”,此本上海图书馆卡片依扉页著录为“民国十一年石印本”,然笔者以为,据其牌记断定为上海扫叶山房民国二十一年(1932)石印本为宜。

四、江永《近思录集注》的抄本

现存世的江永集注《近思录》主要是刻本,抄本很少。清乾隆三十七年至四十七年(1772-1782)纂修《四库全书》,其中抄录江永《近思录集注》十四卷,四本。半页八行二十一字,注文小字双行二十一字,卷端题“婺源江永撰”。版心抄大小书名“钦定四库全书”、“近思录集注”。正文前有馆臣撰写的《提要》。没有抄录江永序文。1983年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的文渊阁本,钐印二方:“文渊阁宝”、“乾隆御览之宝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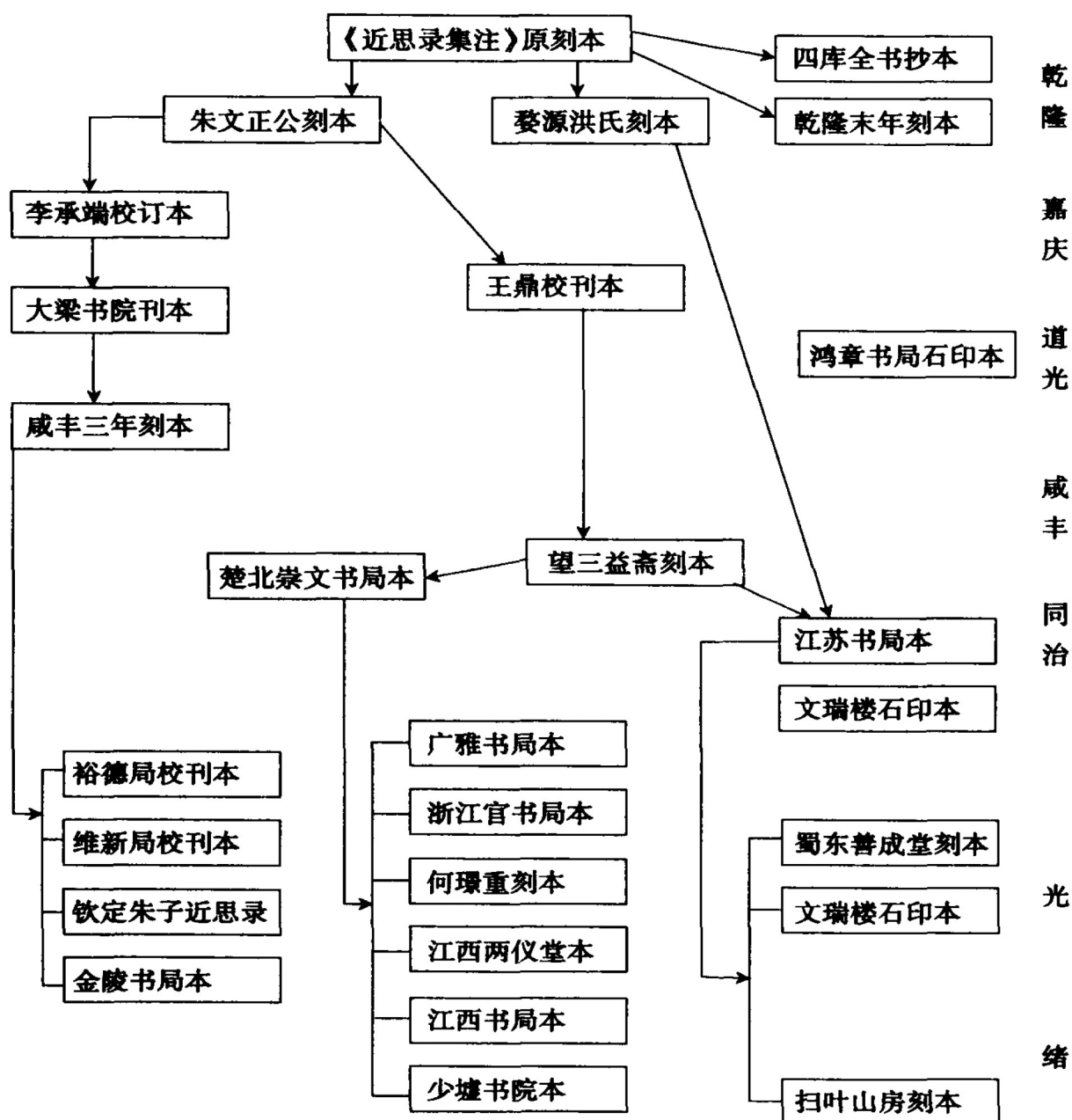
而据嘉庆十二年《近思录》刻本卷末李承端跋文来看,朱珪亦有抄本:“前秋谒相国石君师,出《近思录集注》抄本语端曰:‘江先生辑朱子之语以注朱子之书,至为精切,虽非时儒所好,然使是书得行,必将有读之而兴起者,用裨益于世道人心不浅。夫人必能体程朱之心,然后能为程朱之学。’”石君即朱珪,曾将抄本《近思录集注》交给李氏。尚不知此本是朱珪所抄还是他人所为。然嘉庆十九年王鼎《朱子原订近思录序》云:“十年前又得大兴朱文正公与徽人之宦京师者新刻江氏本,合而校之,藏诸篋中。”那么,王鼎得到的是朱珪新刻《集注》。又据道光二十四年张日畧重刊序云:“道光壬寅,日畧承乏大梁,给谏星湖前辈方主讲于斯,每进诸生课以前贤语录文字,士多砥行自爱者。一日携此本示余,大兴朱文正公所刻也。”依此,张氏亦经见过朱珪刻本。同治三年吴棠望三益斋重刻《集注》时,其跋文推断:“文恪《序》廿年前所得完善本,合徽人新刊刻本校之,则即李《跋》所谓文正抄本。”则以为朱珪有抄本。

至于上述李、王、张、吴四人所言朱珪的那个本子是抄本还是刻本,如今不见此本,一时难定。笔者以为乾隆年间朱珪对江永《近思录集注》很感兴趣,抄录或刊刻也是情理之事,其版别的具体情况尚待进一步探究。

综观清代中后期到民国初年江永集注《近思录》的传本,乾、嘉、道、咸、同、光等朝均有传本存世,虽说时代较晚版本易存,但此种盛传迹象仍是难得。

经笔者目验、比对、梳理,认为江永《集注》主要依靠这四个传刻系统广泛传播:(一)江永集注《近思录》原刻本及其重刻本,其中重刻本以大梁书院刻本为代表;(二)王鼎校次刊本《朱子原订近思录》传刻系统,在清嘉庆、同治、光绪朝尤盛行;(三)江苏书局刊本《集注》的传刻系统,既保留了江永《集注》原本的主要内容,又增附《校勘记》一卷,体例比较完善,其传本多以石印本形式出现;(四)抄本《集注》。总之,江永《集注》的不断传刻、广泛流布,在清代中后期朱子学传播历程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。

附:江永集注《近思录》版本源流图



作者工作单位:中国计量学院中文系